**罗伯特·范诺伊，预言基础，第 11 讲**

**先知和邪教，先知是作者吗？**

评论：《先知书》是作者吗？   
b.文学批判学派继续 在有关预言书籍写作的讲义中问道：“先知是作者吗？”我们研究了先知是作家的传统观点。我们从 b.“文学批判学派”开始，该学派也将先知视为作家，但随后试图在预言书中找出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出自先知之手，而先知的名字被赋予了书，并将其从后来的补充中整理出来。我上次提到，就批判性学术而言，最常关注的两本书是《以赛亚书》和《但以理书》。我认为以赛亚和但以理受到关注的部分原因是在以赛亚书第二部分中发现的非凡的长期预言以及但以理的众多异象。那些具有历史批判心态和启蒙世界观的人，不接受超自然和神圣干预人类事务的存在，当然也看不到圣经所描述的神圣启示。他们有一个问题，例如在《以赛亚书》第二部分中提到居鲁士，他生活在先知以赛亚之后很久，或者《但以理书》中的长期预言以及但以理书的长期预言关于生活在公元前二世纪的安条克·埃皮法尼斯时代的末世论材料，但以理怎么可能知道呢？因此，得出的结论是，《以赛亚书》第二部分与《以赛亚书》第一部分不是同一位作者写的，但以理书是后来写的，而不是最初的先知但以理写的。

1. 以赛亚书 40-66 章（续）

b. “这本书的两个部分在语言和风格上存在差异。”  
 我们开始研究持这种观点的人用来断言以赛亚书 40 章不是来自以赛亚书的一些论据。在第一页底部的讲义中，我总结了三个论点。首先，“以赛亚书 40-66 章中的概念和思想与本书第一部分（1-39）中的概念和思想不同。”其次，“这本书的两部分在语言和风格上存在差异。”第三，“历史背景和事实存在差异”。我们已经研究了第一个论据中的回应，即以赛亚书 40-66 章中的概念和思想与本书第一部分中无争议部分的概念不同。我认为我们对第三页的第二个论点没有做太多的工作，即源于语言和风格差异的论点。我认为这是一个比第一个更重要的论点，因为第一个论点涉及主观判断，即概念和想法必须有多大不同才能需要不同的作者。正如我所提到的，我认为上帝没有理由不能在以赛亚漫长的事工后期而不是早期向他透露有关主的仆人主题的材料。这是一个新概念，但不一定需要新作者。  
 当你谈到语言和风格时，争论就更重要了。 Driver 列出了在 40-66 中出现很多但在 1-39 中不出现的单词，或者在 40-66 中频繁出现但在 1-39 中很少出现的单词。因此，从这个特定的角度来看，你开始观察单词的用法，你会发现其中的差异。对此，可以说，你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发现与第一部分相比不同的单词或表达方式并不奇怪，因为主题不同。如果主题不同，您就会期望用词有所不同。所以我认为这个论点也没有说服力。  
 从风格上 最有力的论据是，据说在以赛亚书 40-66 章中发现了后来出现的某些语言上的奇怪之处。德赖弗在他的*《旧约导论》第 240 页中对此进行了论证*。详细研究这个问题需要大量的时间，所以我不想花那么多时间，但让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在*Aalders*的著作中 *在《旧约导论》*中，他讨论了德赖弗的论点和其他论点，他指出，他们提出的一个风格论点是以赛亚书第二章中偏爱第一个单数“ *ani”*而不是*“anoki”，*因为你知道两者都是第一人称代词。据说这表明了后来的语言用法。在以赛亚书 40-66 章中， *'ani*出现了 79 次*，'anoki*出现了 29 次。所以，是的，以赛亚书 40-66 章中偏爱*'ani* 。但是，奥尔德斯指出，如果你看看哈该和撒迦利亚书，就哈该而言，这两本书显然是流亡后的， *“失落*根本没有发生；” *'ani*是 5 次， *'anoki 是*0 次。在《撒迦利亚书》中， *'ani*出现了 9 次， *'anoki 出现了*0 次。如果你回到以西结书——比哈该书和撒迦利亚书早一点——你会发现*'ani* 162次和*'anoki* 1次。那里有一个事件。阿尔德斯指出，以赛亚书 40-66 章时代不使用*'anoki 的*趋势并没有像以西结时代那样发展。这往往是说以赛亚早于以西结。换句话说，以赛亚书第二部分的使用模式不适合流放后的时代。所以以赛亚必定早于以西结。因此，您可以查看其中一些语言用法并提出有关它们的问题。  
 我认为在硬币的另一面，即第 4 页，您还可以在书中的两个部分之间找到您可能称之为语言奇怪之处的语言一致点。例如，先知们经常使用的表达方式“耶和华如此说”在以赛亚书中有一个变体，而该变体只出现在以赛亚书中。该变体用不完美的“ *yomer ”取代了完美的“ 'amar* ”，从而表示持续的行动，“主如此说。”这种变体是以赛亚所独有的。它在变体参考文献中的 1-39 以及 40-66 中都有使用，并且还有更多参考文献扩展到整本书。因此，这种表述在所有先知中都很常见，但它出现在《以赛亚书》的一个变体中，而且这个变体出现在《以赛亚书》的两部分中，这一事实无疑表明作者身份的统一，而不是多个作者。   
  
1) Rachel Margalioth 反驳《以赛亚书》风格的论证现在我给出 ' *anoki和yomer*的不完美用法的两个例子，因为当你进入这种语言用法时，它很快就会变得非常复杂。我认为，如果您对此感兴趣并花时间去做并查看一些讨论它的文献，您会发现争论是双向的。事情并不像看起来那么清楚。本书第一部分的语言和风格与第二部分不同。一位名叫雷切尔·玛加利奥斯 (Rachel Margalioth) 的女士进行了一项名为*“不可分割的以赛亚”的研究。*该书已绝版，但非常有用。她有效地论证了基于语言和风格一致的本书的统一性。换句话说，这个论点被颠倒过来了。如果你看一下第 14 页上的引文，请向下翻到该页中间从第 14 页中间开始的大段落，Margalioth 说：“克劳斯列举了以赛亚‘第二个’‘特有’的十八个单词和表达方式。正如他承认的那样，其中一些也可以在《第一本以赛亚书》中找到，但克劳斯将其归于《第二本以赛亚书》的章节中。”强加于文本的内容不符合以赛亚书的那一部分。 “但是，即使这种表达方式的数量要多得多，又能从中推出什么证据呢？某章或其他章节中的特殊词语或表达方式能证明什么吗？这一事实是否足以将本章或任何其他章节与本书的正文分开？在先知书中，一个或多个词在某些章节中出现多次并不罕见，尽管在前面的章节中甚至一次也没有出现过。以“耶和华的报应”一词为例，它在耶利米书第 50 章和第 51 章中多次出现，但在整本书中却没有再出现。这是将这两章从书中分开的充分理由吗？”她所说的只是因为你有两个词出现在那里，而其他地方没有出现过，这是否让你有理由怀疑这两章是否是耶利米写的？  
 或者，‘被刀杀’这个词在以西结书第 31 章和第 32 章中出现了不下 10 次，但在前面的章节中一次也没有出现过。以西结书 31 章是第二部以西结书的开始吗？在每一本预言书中，都可能指出仅在一个章节或一组章节中多次出现的大量单词、短语、表达方式，而在书中的其他地方没有出现。那么我们就得出结论，这些单词和短语在上下文中是受欢迎的。”   
  
2) Margalioth 对以赛亚统一性的论证 你看，如果你有不同的语言，它可能与讨论的主题或先知在那些特定章节中给出的具体信息有更多的联系。 “关于本泽夫所想到的以赛亚书两部分在语言和风格上不同的论点，是无法用例子证明的，我们将在本书中通过数百个例子来证明，事实恰恰相反。这两个部分不仅在语言和风格上相似，而且它们的统一性也很显着，因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不能归因于任何影响……这里的系统将展示两个部分的统一性，”下一段是在第 4 页的讲义上，玛加利奥斯描述了她使用的系统，“在按主题对《以赛亚书》进行分类后，我们发现，对于每个主题，两部分都采用了无数类似的表达方式，这些表达方式仅适用于这本书。事实也证明，两部分的具体表达方式具有相同的活力和相同的用法。即使是常见的表达方式，也可以通过两者相同的特定用途来区分。第二部分颠倒了第一部分的内容。您会在第 4 页、第 5 页和第 6 页上找到她用来按主题内容对《以赛亚书》进行分类的主题。  
 我不会通读所有材料，但让我们看一下她的一些主题分类。第一，“上帝的名称”以及她列出的以赛亚书中专门使用的神圣头衔，在这两部分中都很常见。换句话说，在其他地方找不到对上帝的称呼——例如“以色列的圣者”，在本书的两部分中都可以找到。或者“以色列人民的名称”，在这两部分中发现了十一个关于犹太人的具体绰号。请看第 9 条“劝诫的话”；以赛亚所特有的二十一种不同的责备措辞，也是两部分所共有的。第 10 条，“惩戒之言”；二十九个字对堕落的具体描述，以赛亚书两节的风格相同。因此，以赛亚书的两部分都表达了十五个类似的主题，而且在许多情况下都是以赛亚书所独有的。因此，我认为玛加利奥斯已经采用了这种风格和语言论证，并为这本书和单一作者的统一性提供了很好的案例。我们将在几分钟后回到这个话题。   
  
3）编辑统一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些批评性的论点主导了这个领域，并使大多数圣经学者相信以赛亚书有多个作者，并且它是基于德赖弗和其他人的论点。这些论点，如玛加利奥斯关于本书两部分语言和风格统一的论点，现在甚至被批评学者所接受。但这并没有让他们得出以赛亚是这本书的作者的结论。他们现在将谈论编辑统一。换句话说，这些其他作家模仿了以赛亚的风格，所以你得到了写作的统一性，但不是单一的作者。我说我稍后再谈这个。但为了回应玛加利奥斯和其他人提出的这一论点，请看第六页的中间。   
  
4) Mark Rooker 有关语言用法和以赛亚书主题的最新讨论，请参阅 Mark Rooker，“约会以赛亚书 40-66：语言证据怎么说？”那是在威斯敏斯特神学杂志卷。 1996 年第 58 篇——如果您对这类事情感兴趣，这是一篇非常有用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鲁克给出了许多例子，说明以西结书和流亡后希伯来语中的语言用法如何一致地反映了比以赛亚书 40-66 章中更晚的语言特征。这再次变得有些技术性，但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并给出了非常令人信服的插图。他的结论是，如果“批判学者继续坚持认为以赛亚书的年代应该是在流亡或流亡后时期，他们必须面对来自历时分析（即使用发展史的分析）的相反证据”希伯来语及其随时间变化的语言用法。  
 我对语言和风格论证的结论是，它不能为这两种立场提供最终证据，尽管历时研究为真实性和统一性提供了最有力的论据。无论如何，对语言和风格的考虑确实不需要以赛亚书的两个或更多作者——这就是我的观点。   
  
5）语言数据的计算机分析 现在，有时进入这一特定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开始出现在圣经研究中的语言使用的计算机分析。如果您查看约翰·奥斯瓦尔特 (John Oswalt) 对《以赛亚书》的 NICOT 评论的第 15 页，他正在讨论这个问题。他说：“最接近客观证明作文缺乏统一性的事情出现在 Y. Radday 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统计语言学角度的以赛亚书的统一性》中*。 ”拉迪对《以赛亚书》的众多语言特征进行了计算机化研究，并对书中各个部分的这些特征进行了比较。作为对照，他研究了其他文献，包括圣经和圣经外的文献，据说这些文献都来自一位作者。这些研究的结果是，他得出的结论是，语言差异如此严重，以至于一个作者不可能写出整本以赛亚书。正如预期的那样，这些结论受到了批评学者的认可，他们认为自己的立场得到了证实……  
 Radday 的方法可能会引发一些问题。统计语言学领域的起步阶段提出了一些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们是否已经足够了解，可以自信地谈论特定人的使用变化可能存在的限制？”如果你观察一个人六十年的一生，他的语言使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多少？ “这并不是质疑拉迪研究的完整性，而是要指出，证据仍然不如第 1-39 章出现的手稿那么客观。  
 现在有两个脚注。您会注意到，在有关“一个人的语言使用变化的限制”的问题之后，有一个 5 号脚注。这里有五个，“请注意，对这本书的特征进行的另一种计算机化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它是一个单一的作品。”换句话说，计算机分析和从中得出的结论是有分歧的。 R. 波斯纳的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该书的构成不是一个整体，但他的结果表明这本书的划分与拉德的不同。现在您会发现任何类型的计算机分析都会产生多种结果，具体取决于您如何设置程序来进行分析 - 其中有很多因素。  
 另一个脚注很有趣。第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称赞拉德戴的方法论适用于以赛亚的可靠性的人，当他最近报告说同样的方法论建立了创世记的统一性时，他们对其可靠性却不太相信。”因此，批判理论的论证是双向的。创世记是一种方式，以赛亚书则是另一种方式。毫无疑问，未来十年将更多地使用计算机对圣经著作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看看它如何发展将会很有趣，但目前还不能得出结论性的结论。我认为基于语言和风格的争论无论如何都不是决定性的。但我认为你可以说的是，这些论点表明你不能最终*否认*以赛亚可能对本书的第二部分负责。  
  
三、历史背景的论证  
 第三个论点是“历史背景论”。这可能是最重要的论点。我认为不可否认的是，第 40 章至第 66 章反映的历史背景与第 1 章至第 39 章不同。在《以赛亚书》的前半部分，有很多对以色列人的责备，并预言上帝将因他们的罪而使以色列人被掳。当我们读到本书的第二部分时，你找不到那种材料。假设他们已经被流放并且审判已经发生。本书第二部分的重点是上帝应许他们将从被囚禁中解救出来。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您多次提到亚述人。他们当时是以色列的大敌。亚哈斯死了。但本书的第二部分关注的不是亚述人，而是巴比伦人和波斯人居鲁士的崛起。当然，赛勒斯的名字被提到了。本书第二部分的人民受到巴比伦人的奴役，但将被拯救。因此，第一本书和第二本书之间的历史立场存在明显的历史差异。   
  
A。解释 既然这是有争议的，你可以用两种方式解释它。批评家认为，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是由另一位作者写的，他生活在已经开始并即将结束的流亡之后。以色列即将获释返回家园。你可以解释的第二种方式是以赛亚写了这本书的两部分，但在这本书的第二部分中，他的目的是在以色列被掳之后安慰以色列人，并宣告上帝会拯救他们。  
 如果你认为以赛亚是作者，那么你必须回答文献中经常出现的问题：以赛亚是否有任何理由写一些涉及他时代一个多世纪后的情况的东西？   
  
3. 以赛亚书第二章历史上的分歧 有些人说：“不，这没有任何意义。”他们用它来论证其他人写了这本书的第二部分。看看你引用的怀布雷图书馆《旧约以赛亚书指南》第 16 页，他说：“这显然是针对一群被征服势力从祖国流放的人，征服势力也提到了这一点。”名称：巴比伦。在四段经文中，用这些术语提到了巴比伦的名字，这一历史情况在许多其他经文中也得到了证实。那么，第 40 章至第 55 章在八世纪就毫无意义，当时耶路撒冷和犹大的人民仍然生活在自己国王的统治下。当时的巴比伦远非强国，只是亚述帝国的城市之一，直到公元前七世纪末亚述灭亡，也就是以赛亚死后很久。 [在先知以赛亚时代，巴比伦是亚述帝国的一部分。]当时居鲁士还没有出生，波斯帝国还不存在。”这就是历史背景的争论。 “另一方面，这些章节中的所有内容作为六世纪先知向巴比伦流放的犹太教徒传达的信息都是很有意义的。换句话说，争论的焦点是，如果以赛亚写了这句话，那么对于他那个时代生活在完全不同环境下的人们来说就毫无意义。这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你问这样的问题：以赛亚书 40-66 章与以赛亚同时代的人有什么关联吗？请参阅霍巴特·弗里曼 (Hobart Freeman) 的引文第 13 页，他在*《旧约先知导论》中对此进行了讨论。*他的评论是：“并不是每一个预言都需要追溯到特定的当代历史情境，也不需要直接适用于它所针对的一代人。正如德赖弗所主张的那样，我们不能坚持认为“先知总是首先对他自己的同时代人说话：他带来的信息与他那个时代的环境密切相关：他的承诺和预测……符合当时的需要”。然后被感觉到。””   
  
b．这种观点的问题——需要安慰的话 与这种预言概念明显矛盾的是撒迦利亚书 9-14 章，这是未来的，但以理书 11-12 显然是未来的，以及以赛亚书第一部分的以赛亚书 24-27 章，这通常是未来的。被称为“小启示录”。以赛亚在那里谈到了主的日子和末日。当然，这并不是要忽视预言与历史情境的一般关系，两者都记录了预言的话语。因此，弗里曼的回应是，并非每个预言都必须直接适用于它所针对的一代人。最常见的是，但也有这样的时候，末世预言的到来，显然是为了解决在先知所说的每个人都早已离开之后很久才会发生的情况。  
 我在这里的评论是回到讲义的第 7 页，虽然弗里曼就他所说的而言是正确的，但在我看来，第 40 章至第 66 章确实与以赛亚时代的人们有关。以赛亚书的前几章有两个目标：向全国宣告其罪孽和悔改的必要性；其次，他告诉他们，上帝将通过流放来惩罚他们。所有这些重点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都非常清楚。尽管总体上他的信息没有得到很好的接受，但还是有一些人倾听并支持以赛亚。正如《以赛亚书》第 6 章所记载的那样，他被告知，在他打电话时，他的信息将被置若罔闻。我认为人们越来越明显地背离上帝。以赛亚书 6:9-10 的预言正在应验，很明显，6:11-12 中预言的被掳将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  
 希西家死后，他的儿子玛拿西继位为王。在玛拿西的统治下，这个国家陷入了可怕的背道之中。列王记下 21 章描述了玛拿西时代的邪恶，他是南国诸王中最邪恶的一个。根据犹太传统，以赛亚在玛拿西统治时期被锯成碎片。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有一个关于被锯成碎片的说法，有些人认为这是暗指以赛亚，他在树洞里躲避玛拿西的使者。树被砍倒了，他也因此被锯断了。现在这可能是杜撰的，但很明显以赛亚仍然生活在玛拿西的时代，尽管，如果你看一下这本书的标题，以赛亚书 1:1 中说：“以赛亚在玛拿西统治时期的异象乌西雅、约坦、亚哈斯和希西家。”它没有提到玛拿西。  
 但如果你看一下《以赛亚书》37:38，你会在其中一个历史叙述中读到：“有一天，当他在他的神尼斯洛克的神庙里敬拜时。 [这是亚述王西拿基立]，他的儿子亚得米勒和沙雷泽用刀杀了他，他们逃到了亚拉腊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作王。”以撒哈顿于公元前 681 年开始统治。 玛拿西于公元前 687 年开始统治。 所以在 681 年，玛拿西已经登上了王位。因此，以赛亚的事工显然一直延续到玛拿西时期。那么为什么标题中没有提到玛拿西呢？有些人认为，在玛拿西时代，一切都很糟糕，以赛亚从公共事工转向了更私人的事工，与以色列的更敬虔的余民一起，而本书的第二部分来自那个时期。  
 但回到我们这里的讲义，当玛拿西成为国王时，犹大背离了主。因此，在好国王希西家死后，以赛亚一定很清楚整个国家不会悔改。流亡是不可避免的。对于神的真正子民、敬虔的余民来说，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在那种情况下，就不再需要继续带来这种责备和谴责的信息了。有一个新的需求。新的需要是为上帝真正的子民，那些追随以赛亚的人，即上帝真正的追随者中的一小部分人，带来安慰和希望的话语。当那些人看到审判和流放即将到来并且不可避免时，就像以赛亚一样，在我看来，安慰和希望的信息是相关的。是的，你会被放逐，但流放不会永远。您将能够返回。因此，即使在以赛亚时代，上帝将拯救他的子民的信息对于上帝真正的子民来说也是一种安慰，对于那些后来经历流放并知道上帝没有抛弃他们的人来说也是一种安慰。  
 我可以说，在以赛亚在世的时候，北方王国就被亚述人流放了。乌西雅在位时间为 729 年至 715 年。北国于 721 年落入亚述人手中，那是在以赛亚在世期间。因此，犹大人知道有一个被掳的事。他们知道，同样的审判已经对他们作出了。有趣的是，在西拿基立的编年史中，他声称不仅将人们从北方王国流放出来，而且还从犹大土地上俘获了俘虏。因此，如果你接受西拿基立的编年史的话，甚至还有犹大人在以赛亚在世时被流放。所以我认为这个信息确实与那个时代相关。流亡并不是结束。神仍然与他的子民同在。未来还有未来。他们将从流亡中归来。翻到第九页的顶部：因此，虽然承认以赛亚书 40-66 章的历史背景是那些已经被流放的人，他们的城市被毁，圣殿成为废墟，但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为什么这段话以赛亚可能不是在被流放到巴比伦之前一个世纪写的。对于他同时代的人来说，没有理由不具有重要意义。   
  
C。总结结论 所以我认为这些是得出以赛亚书第二部分不是先知以赛亚所写的结论的三个主要论据。概念和思想的差异，语言和风格的差异，或者历史背景的差异——我认为这些论点都不能得出结论说一定有第二个以赛亚来写40-66章。因此，这些主要论点无法证明作者身份的多重性。   
  
d) 支持以赛亚书统一性的一些最终论据——新约引文 我认为，相反，有一些强有力的理由维持以赛亚书的作者身份。首先，没有任何手稿证据表明这本书除了目前的统一形式之外曾以任何形式存在过。当然，有趣的是，死海古卷中有一份公元前二世纪的整部以赛亚书的手稿，见证了它的统一性。那已经很老了。 《七十士译本》也没有将它们分开，它们来自公元前 250-200 年，因此，一些非常早期的手稿证据支持统一。  
 其次，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你有新约见证以赛亚的作者身份。以赛亚书在新约中被引用了大约 21 次。这些引文均取自本书的第 1、6、8、9、10、11、29、40、42、53、61 和 65 章。特别注意约翰福音 12:38-40，其中你读到“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 “主啊，谁相信我们的信息，主的膀臂向谁显现？”这是出自《以赛亚书》53:1，这是本书的第二部分。 “因此，他们无法相信，因为正如以赛亚在别处所说，‘他弄瞎了他们的眼睛，麻痹了他们的心，使他们既不能亲眼看见，也不能用心明白，也不能回转，我会医治他们。’”摘自以赛亚书第 6 章：10。因此，在该引文中，您可以引用本书第二部分的一个引文和本书第一部分的一个引文。据说这两句话都出自先知以赛亚。在第 41 节中，约翰补充说，以赛亚这样说是“因为他看见耶稣的荣耀，就论到他”。在路加福音 4 章 17 节中，你读到先知以赛亚的书被赐给耶稣，他读了第 61 章，那里引用了这本书。这是本书的第二部分。在使徒行传 8 章 30 节中，埃塞俄比亚太监正在朗读先知以赛亚，他所朗读的内容是第 53 章。因此，这些是新约引用的几个例子，这些例子清楚地将本书第二部分的材料归因于先知以赛亚。 e) 朗曼和迪拉德，《旧约  
  
导论》 现在，我刚刚在课堂上分发了雷·迪拉德和特伦珀·朗曼所著的 *《旧约导论》*第 274-275 页的单页讲义，这是由雷·迪拉德和特雷姆珀·朗曼撰写的相当新的旧约导论。两位非常有能力的福音派学者。我想和你一起看看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对这个问题做了什么。关于首页第 274 页第一段的中间，朗曼和迪拉德说，“在某些方面，关于以赛亚书统一性的争论已经回到原点，有一个关键的区别：”（这就是前面提到的）“而不是这本书现在被广泛视为经过编辑的统一体，而不是由单一作者之手产生的统一体。一些学者现在不再将《以赛亚书》40-66 章视为意外附加在八世纪先知作品之后的一部独立作品，而是认为，《以赛亚书》40-66 章除了本书的前半部分之外从未存在过，并且它是由（通过什么）写成的。根据早期材料，这可能是一个复杂的编辑过程。”因此，当您查看当今的文献时，您经常会引用一本书，但不会引用一位作者。这本书有多个作者，有时甚至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才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形式。因此，书中存在统一性，但作者身份不统一。  
 迪拉德和朗曼的下一部分称为“评估”，他们在这里评估当前的形势和问题，“在许多方面，当代关于以赛亚的批判性思维已经从十八世纪末到早期学术界的过度行为中恢复过来。十九世纪。批评学者之间的共识已经朝着承认保守派所珍视的大部分内容的方向发展：以赛亚不是偶然事故和内部矛盾的结果，而是这本书是一个整体，显示了事物和主题的统一， ”——这就是玛加里奥斯所说的。这些主题和本书两部分的语言是一致的。 “大部分辩论的主旨已经从关注剖析文本以恢复来源和背景，转向努力阐述现有文本的连贯性和统一性。”  
 这反映了对文本最终形式的分析从历时性向共时性的转变。现在，过去20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们关注的是文本的最终形式，而不是如何形成最终形式。相反，他们同时关注将文本组合在一起的因素。保守派关于基于共同主题和词汇的作者统一性的论点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接管并被迫用于论证，而不是证明其统一性，而是证明书中的编辑统一性。我想稍后再用其他讲义来讨论这个问题，但让我们更进一步。  
 “可以肯定的是，批判性和保守性思想在作者身份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尽管人们对《以赛亚书》的整体统一性越来越有共识，但对于批判性学术而言，这是通过修订历史形成的统一性，而不是源自单个作者的统一性。”在接下来的两段中，他讨论了保守主义观点，然后讨论了批判性观点。他说保守派思想植根于其对两件事的神学信念。首先，关于预言启示的现实，上帝的灵确实让古代作家看到了未来。其次，关于整本圣经的完整性和可信度，即陈述、题注和新约引用都需要接受。   
  
1) 神与对未来的预测 以赛亚书 40-66 章的持续争论是，以赛亚宣告了未来，而神能够实现它。换句话说，对居鲁士的提及不仅仅是对某个未来统治者的孤立提及，而是融入了贯穿全书的持续论点，即上帝能够预测未来。一个例子就是即将到来的弥赛亚的仆人主题。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另一个维持仆人序列的长期预测，它比赛勒斯的预测更引人注目。 “在《以赛亚书》第 1-39 章中，几乎普遍认为一般以赛亚式的段落中就预见了流放和复兴。先知在他的呼召中预见到耶路撒冷将被摧毁和人口减少的那一天，并根据预期的复兴命名了一个儿子（“Shear-jashub”的意思是“余民将回归”）。先知在以赛亚书 1-39 章中普遍使用的残余主题预示着来自巴比伦的威胁。先知明确表示，他自己的理解是，他的预言与眼前的未来无关，而是与遥远的未来有关。”所以他说了那些关于保守观点的事情。  
 “批评意见最重要的事实是，以赛亚书 40-66 章假定的历史背景不是八世纪以赛亚在耶路撒冷的历史背景。”这是我们在“历史背景”标题下讨论的第三个论点。现在他说这两种立场都需要仔细审查，这就是他在第 275 页所做的，“一方面，如果一个人接受主权神的现实和先知的灵感，他就不能说，‘神不可能以这种方式向以赛亚显现自己.'这种对历史批判的天真的信心与坚持他所做的一样，都是一种神学陈述。   
  
2）与申命记的比较。 34 然而，另一方面，当批评学者从《以赛亚书》第 40 章至第 66 章的背景中得出结论认为，这些章节的作者在巴比伦流放中生活得相当晚时，这在原则上并不是一个不同的论点。本书中所持的立场原则上与保守派准备提出的论点没有什么不同，例如，关于申命记 34 章的论点。”申命记 34 章是关于摩西之死的一段经文。看看他为什么这么说：“无论人们对摩西和申命记之间的历史关系做出什么结论，很明显摩西并没有写下他自己的死亡记录（申命记 34:1-8）；本书最后一部分的作者生活在一个时代，许多先知来来去去，但没有一个像摩西那样。这就是说，本章所假定的背景（摩西死后的某个时间）排除了摩西所写的可能性。尽管《新约》引用了《申命记》并将其归于摩西，但没有人会认真争论这包括《申命记》第 34 章。认识到《申命记》第 34 章的背景需要一位生活在摩西之后的作者（传统上指定该书的作者）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认识到以赛亚书 40-66 章的背景假定作者生活在流放期间。”现在你知道论证是如何提出的了。申命记通常归因于摩西，但由于历史背景，很明显摩西没有写第 34 章。以赛亚书通常归因于以赛亚，但由于第 40 至 66 章的历史背景，以赛亚不一定是这样的情况写下它们。他们的论点是申命记 34 章和以赛亚书 40-66 章之间存在类比。   
  
3）反对申命记。 34 比较

在我看来，这个类比是有问题的。根据这一论点，我不准备承认以赛亚书 40-66 章的作者是除以赛亚之外的其他人。我只想提出几点。申命记 34 章有十二节。这是历史材料。它确实给出了本书的结论，因为导致第34章的是摩西和约书亚之间的领导权转变——摩西和约书亚的转变确实随着摩西的去世而产生影响。如果你进入约书亚，约书亚已经取代摩西成为以色列的领袖。在我看来，申命记 34 章和以赛亚书 40-66 章之间存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差异。正如我所说，申命记是十二节经文和历史叙述。以赛亚书 40-66 章有 27 章，是极其重要的预言性话语。迪拉德和朗曼说，新约引用了申命记并将其归功于摩西。是的，但它没有引用第 34 章中的任何内容并将其归因于摩西。换句话说，这是有很大区别的。当我们查看《约翰福音》12:38-40 时，其中引用了该书的第二部分，并且认为这是以赛亚的著作，没有任何内容可以与《申命记》相媲美。我们确实有参考文献将申命记归因于摩西，这很重要，因为今天申命记也受到质疑，但新约圣经中没有引用第 34 章中的任何内容。所以，我不太确定这个类比是否真的足以证明以赛亚书 40-66 章不是来自先知以赛亚的可能性。   
  
4）朗曼/迪拉德——《以赛亚书》中未提及以赛亚书。 40-66 请注意他们进一步说的话：“本书的后半部分没有提到以赛亚。然而，预言灵感的现实并没有因此而消除：一位后来生活在流亡中的作者通过神圣的灵感预见到了上帝将要通过居鲁士所做的事情，就像以赛亚看到上帝很快就会对提革拉毗列色三世所做的事情一样。这位后来的作者看到了以赛亚关于流亡的预言和在他那个时代发生的残余事件，他写下这篇文章来发展和应用以赛亚的讲道给他的流亡同胞。虽然这位伟大先知的匿名是一个问题，但这并不比历史书或希伯来书的匿名更不寻常。”我想说，这种匿名性是一个问题，特别是因为，与历史书籍相反，你没有像以赛亚书 1:1 这样的经文。以赛亚书 1:1 介绍了这本书：“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所看见的异象。”这个标题似乎是整本书的标题，归因于以赛亚。我们史书中没有这样的记载。所以最后一段说，“它不应该成为神学*陈词滥调*或正统检验。在某些方面，争论的最终结果有些没有意义，无论是由以赛亚在八世纪写的，还是其他人在后来应用了他的书面见解，以赛亚书 40-66 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流亡社区的需要”。   
  
5) 理查德·舒尔茨 (Richard Schultz) 对以赛亚书的回应 我给你的另一份讲义是摘自 2004 年出版的 *《福音派与圣经》*一书的一篇文章，我给你的那篇文章是理查德·舒尔茨 (Richard Schultz) 写的，题为“有多少以赛亚书”这有什么关系呢？最近福音派学术中的预言性灵感。”我认为这是一篇好文章。让我请您注意几页。请注意他在第 158 页底部所说的内容，其中他谈到了福音派学者愿意对圣经文本进行补充和修改。他说：“然后，他们维持他们对圣经的福音派观点，只是简单地将默示教义延伸到涵盖他们刚刚提出的内容。”换句话说，他所说的是，许多福音派学者继承了许多批判学者的方法论，但随后扩大了他们的默示观点，说所有这些编辑和后来的版本也都假设在默示教义之下。 “然而，有人想知道，只要确认传统作者在这一过程中的‘实质性参与’，是否任何一种关于圣经文学起源的历史批判理论都能被福音派所接受。”  
 他接着说，“我仍然不相信知识的诚实和文本证据要求福音派承认当今大多数旧约学者所声称的以赛亚书复杂的写作历史。”  
 在第 161 页的中间，他说：“问题是，当文本中*没有承认*多个先知的参与，并且假设这样的原因之一时，我们是否可以合法地假设一系列受启发的作者或编辑。一个复杂的创作过程是声称上帝的灵*无法*（或至少可能*不会*）仅向一个人揭示以赛亚书中确定的内容的多样性。”好问题。  
 翻到第 162 页第二段，“（耶鲁大学的）柴尔兹指责保守派将以赛亚变成‘未来的千里眼’”，以那种特殊的保守风格。舒尔茨在下一段中说：“对赛勒斯的麻烦提及可能是许多福音派学者放弃或至少质疑单一作者解释的主要原因。然而，在以赛亚书 41-42 章中，居鲁士的形象与仆人的形象并列在一起，两幅肖像都使用了相似的表达方式。如果居鲁士已经出现在现场，那么这个仆人也一定是与所假定的先知第二以赛亚同时代的人吗？”往下写几行，“然而，如果先知有可能在当时谈论精神拯救者耶稣在七个世纪后的到来，那么想象耶路撒冷的以赛亚谈论居鲁士，会有问题吗？他的政治先驱，仅仅两个世纪后的未来？”   
  
6) Vannoy 对 Longman/Dillard 的回应 现在翻到最后一页第 170 页第二段，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那里有多少以赛亚书，这有什么关系。” “迪拉德和朗曼断言，‘在某些方面，辩论的最终结果有些没有实际意义。’相反，我试图证明，对于预言书中的预言默示、预测性预言、修辞连贯性和神学发展的本质，采用历史批判性结论会产生重大后果——这些后果在《圣经》中被忽视、淡化或否认。我们最近调查的福音派（和非福音派）文献。”所以这是一个持续的争论。您可能有兴趣进一步阅读，但我们不会阅读整篇文章；我刚刚强调了几件事。   
  
2. 但以理书——主流批评学者普遍认为，但以理书是虚构的  
 第二，“主流批评学者普遍认为但以理书是虚构的。”他们认为这本书是在公元前 165 年之前不久，以色列在安条克·埃皮法尼 (Antiochus Epiphanes) 统治下遭受苦难时写成的。然而，这本书本身却将但以理描述为这一预言的提出者，时间是在居鲁士于 539 年占领巴比伦之前和之后不久。所以这就是问题。我们应该将《但以理书》中的预言归功于谁——约 539 年的但以理本人，或生活在公元前二世纪马加比时期（约公元前 165 年）的某个匿名人物  
 我认为，主流批评学者得出冗长结论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我所说的根本问题；人们普遍认为预言一般不会发生。其次，据说书中所谓的历史错误反映了其起源很久之后所描述的事件，当时写这本书的人要么不知道，要么忘记了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事情。第三是所谓的晚期语言指标。   
  
A。 “预言不会发生。”  
 那么让我们看看这三个论点。假设 A. “预言不会发生”。这本质上是一个哲学世界观问题。如果宇宙是一个封闭的因果关系连续体，其中没有神圣干预的空间，那么你当然就没有神圣的启示。丹尼尔不可能讲述在我们归因的时间之后很久才发生的事件。如果你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真正的预言没有也不可能发生，那么就会立即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它在《但以理书》中占有重要地位。   
  
1) 但以理书第 2 章和第 7 章以及批判理论 例如，但以理书第 2 章和第 7 章是一系列帝国吗？在《但以理书》第 2 章中，你可以看到形象的异象，头是金的，胸和臂是银的，肚皮和大腿是铜的，腿和脚是铁的，这描绘了四个帝国的继承，这些帝国将在近东。在《但以理书》第 7 章中也发现了同样的帝国继承，但其中描绘了四种不同类型的动物。现在，第七章中不再有金头、胸部、手臂、腹部、大腿和脚，而是狮子、熊、豹子和一些无名的可怕野兽。传统的解释是，这些动物的象征意义，以及图像中的那些部分是图像中的金头，是巴比伦王国。胸部和手臂是玛代波斯王国。腹部和大腿是希腊王国、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继承者。腿和脚是罗马王国。现在，这个顺序并不符合主流的批评方法，因为罗马帝国在历史上直到希腊时期的安条克·主显尼时代之后才崛起。这反过来意味着，将这本书定为安条克·埃皮法尼斯时代的主流批评学者，必须找到在这本书据称写成之前存在的一系列帝国，否则你就又回到了预测。如果你有罗马王国，即使在安提阿古时代，它还不存在。  
 所以，持批评态度的学者们普遍认为金头就是巴比伦王国。胸部和手臂是一个虚构的米底王国——我说“虚构”是因为巴比伦帝国和波斯帝国之间没有独立存在的米底王国。在波斯人征服巴比伦之前，米底亚就成为波斯的一部分，因此，那些获得了四个王国序列的批判学者必须在巴比伦和波斯之间创建这个米底王国，而这在历史上是不准确的。但腹部和大腿必须是波斯人的，然后腿和脚将是希腊人的，这样就可以在据称写成的时间得出结论。  
 如果但以理的预言描绘了这种特殊的王国继承，那么它们在历史上就是错误的。对于批评学者来说，这没有问题，因为他们只是声称这些预言的作者生活在几个世纪后的马卡比时期。他可能只是对早期的历史进程感到困惑，并错误地认为波斯和巴比伦时期之间的米底有一个独立的存在。结论是：“我们比作者但以理更清楚，无论他是谁，他只是错误地理解了王国的顺序。”   
  
2）对丹中历史错误的批评理论指控的回应。 2 & 7 所以你有这样的假设：真正的预言不会发生。这些历史错误，正如我们刚刚指出的，所谓的主要历史错误之一是这个虚构的米底王国的存在，但他们的其他错误包括——我将在这里提到三个，其中没有一个非常重要：提到伯沙撒而不是当巴比伦人落入波斯人之手时（但以理书 5:30-31），据说那波尼度是一个历史错误。 “就在那天晚上，巴比伦国王伯沙撒被杀，米底人大流士在 62 岁时接管了王国。”我们稍后会回到这个话题，但人们经常争论伯沙撒不是统治者，而是拿波尼德。  
 其次，在但以理书所描述的历史背景中，从未存在过一个名叫大流士的米底人。同一节经文谈到了米底人大流士接管了王国。第三，但以理书 5:2 和 22 中对尼布甲尼撒作为伯沙撒的父亲的记载根本不准确，因为伯沙撒将是孙子而不是儿子。对所有这些指控都有合理的回应。   
  
a) 拿波尼达和伯沙撒 首先，巴比伦的历史资料表明，拿波尼达任命他的儿子伯沙撒为共同摄政王，同时他离开巴比伦前往亚述和阿拉伯北部。但以理书 5:29 说他们一体统治。很可能那波尼度那天晚上不在场，而他的共同摄政王伯沙撒在从巴比伦统治向波斯统治过渡的时期掌权。   
  
b) 谁是米底人大流士 第二，虽然在圣经之外确实没有提到米底人大流士，而且伯沙撒和拿波尼度在波斯居鲁士的继承权之间也没有间隔——是居鲁士接管了巴比伦王国——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丹尼尔是错误的。人们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建议来试图识别米底人大流士的身份。这可能是居鲁士本人的另一个名字，也许是一个王位名称。在历代志上 5:26 中，你提到提革拉毗列色王为普勒。居鲁士也被称为米底人大流士吗？这是可能的。有些人看《6:28》，其中说：“但以理在大流士和波斯人居鲁士统治期间繁荣昌盛”，有些人将其翻译为只是缩小范围——甚至在居鲁士一世统治时期也是如此。所以大流士和居鲁士是一样的。这是可能的。其他人则认为这是另一个名叫古巴鲁的人，这个名字出现在巴比伦文献中，居鲁士任命他为巴比伦总督。他的名字叫古巴鲁，也被称为大流士。你看，虽然我们确实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解决米底人大流士的身份——而且我们也没有——但我认为这并不是断定这本书是在马卡比时期写成或这本书在历史参考上必然有错误。   
  
c) 尼布甲尼撒是父亲还是祖父？ 第三，将尼布甲尼撒称为父亲而不是祖父是闪米特人的常见用法。令人惊讶的是，这甚至被用作论据。简单地说，他是祖先，伯沙撒是后裔。如果您查看引文 DR 中的第 17 和 18 页戴维斯不是福音派人士，他在他的《旧约但以理书指南》中说：“批评评论，尤其是在世纪之交，充分强调了伯沙撒既不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也不是巴比伦国王的事实。有时，这种说法仍然被重复作为对但以理历史真实性的指控，并受到保守派学者的抵制。但自 1924 年以来就已经很清楚了，虽然拿波尼度是新巴比伦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但伯沙撒实际上在统治巴比伦。那么，从这一点来看，丹尼尔是正确的。 “儿子”的字面意义不应该被压抑；即使它可能会暴露但以理方面的误解，但包含这样的薄弱论据并不能增强反对但以理历史可靠性的有力证据。”因此，这些都是据称存在的历史错误，向某些人表明但以理不是作者。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转录：本·黑尔  
 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Ted Hildebrandt) 粗略编辑  
 最终编辑：凯蒂·埃尔斯 特德·  
 希尔德班特重新叙述